

目 录

- 永远不能忘记日本侵华的历史 肖 克(1)
- 人民战争的胜利 杨成武(3)

学海撷珠

- 从华北危机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 莫吉今(5)
- 关于《田中奏折》的来龙去脉 高殿孝(21)
- 国共第二次合作对抗日战争胜利的作用 郑则民(36)
- 论卢沟桥事变的进程与全国性抗战的实现 常 斌(44)
- 论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前期
- 华北几军对中国共产党力量认识的演变 丁则勤(59)
-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廉政建设 孙金铸(79)
-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养战 赵王光(95)

史坛信息

- 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综述 齐宾林(112)
- 欧美学术界开始高度评价中国
- 抗日战争的地位 周 章(119)
- 中国抗日战争史北京研究会正式成立 吉 青(123)

译文资料

- 日本军国主义制定侵华政策之基础 王美秀 译, 马成 校(127)

史海秘闻——战后美国政府庇护

日本细菌战犯始末 胡学亮译(145)

亚洲太平洋战争研究引论(上)

从满洲事变到中日战争(国际关系)..... 陈文奇(159)

读书札记

袭击阳明堡日军飞机场究竟在何时 王人广(183)

卫立煌何时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 竹林(186)

抗战回忆

坚持平西抗日游击战争纪事 李永靖(188)

博物馆内

充分发挥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爱国

主义教育阵地作用 张承尧(197)

民族英雄的颂歌——

《北京地区抗日战争史迹展览》巡礼 王 磊(200)

讲解工作应追求美 于延俊(203)

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 吕叔萍(205)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大事记(1989年10月—1990年11月)

永远不能忘记日本侵华的历史

——肖克同志在抗战馆纪念“七·七”

五十三周年会上的讲话

“七七事变”五十三周年之际，我们在这里召开纪念会，非常有意义。这里我想讲二点。

第一，五十二年前的今天，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日子，我们老同志都记忆犹新，中国的历史专家也非常了解这段历史。今天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永远不能忘记过去的历史。抗战时期，晋察冀的八路军，在中央及聂荣臻司令的领导下，把北京周围的游击战发展起来了，在太行山开辟了根据地。前儿尔，我写了一篇小文章，叫《八路军保卫北平城》，讲的就是晋察冀抗日斗争的内容。第二，抗日战争是伟大的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战争，当时我们每个人为了民族危亡，都在做敌人作英勇的斗争，许多同志为此壮烈牺牲，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那些没有牺牲的同志同样也为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

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就要发扬过去的光荣传统，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我们知道中国是个底子薄、人口多的国家，要把中国建设成富强的国家，没有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是不行的，今天我们的生产水平不算高，我们不能要求高消费，过份的高消费，对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不利。当然，我说的艰苦奋斗并不是要回到过去在山区打仗那种生活方式。我们要的是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的艰苦奋斗，我们在山区时没电灯，今天我们有电灯，不是很好吗？第三，我们不论年老的同志还是年轻的同志，都要记住，

现在日本的一些军国主义分子并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他们不会忘记过去侵略中国所得的利益。这些年来，说他们的军费不超过百分之一，实际每年都超过，因为他们的国民经济总值每年都是百分之十五的增长，军费开支也会随其速度增长。因此，我们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当然，日本的绝大多数人是爱好和平的，我们也不能否认。

今天是纪念“七七事变”五十三周年的日子，我们大家要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人民战争的胜利

——杨成武同志在抗日战争史

第二届学术会上的讲话

今天能有机会参加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会议，感到非常高兴。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我在那时参加了改编后的第一次战役——平型关战斗。这以后日军急速从平津向张家口、大同、太原进攻。我这个部队奉军委和115师首长的命令随后向敌后挺进。我这个部队过去是红军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一师，改编我任政委兼师长，改后任115师独立团团长。我部一到敌后，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参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部一下就编成了五、六个大队，以后这支部队就成为晋察冀根据地的主要力量。

当时，老百姓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给了我们那么大的支援，把自己很少很少的粮食、生活用品都送到了前线，送给了八路军。为什么老百姓都跟着共产党走，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党，是反帝反封建的先进的党。我们党在抗战中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战术，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以后的斗争中取胜，才能在冀中平原上坚持游击战争。才能开展对付日军的地道战。我在冀中的时候（1944年），有多少地道？有一万六千多里长，都是老百姓一点一点挖出来的。在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后，敌人在各村设立碉堡，每一个村庄都几乎被敌人控制，老百姓有句话：出门登公路，

抬头见岗楼，无村不戴孝，处处是狼烟。我当时是冀东军区司令，穿便衣白天在地道里躲藏，晚上骑车出去，一口气走一百多里路，昼伏夜行，我通讯联络的电台都在各家各户，在1941—1942年抗战爆发很苦的时期，老百姓和我们同甘共苦，党、政、军民之间、上下之间、团结如一家。我的回忆录《敌后抗战》里写着“有一个村子，二十多个老百姓为了保护地道，竟有14人惨遭杀害，结果地道保住了，还有狼牙山五壮士，我当时命令他们在适当的时间就撤退，离开阵地，但他们担心还有很多老百姓没撤完（当时有三万多老百姓，五个县大队，五个县委、县政府），主动将敌人引上山顶峰，最后跳崖。日军占领狼牙山后，全体脱帽，向五壮士行礼，所以我们讲民族气节、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是非常必要的，总之从我个人的经历中体会到，打击日本侵略者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的支持与援助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我还要举个例子，大同以西在战争年代很穷，有的—家人四、五口轮穿一条裤子，每个家里都有人患了病（因吃树叶吃的，不能治疗），我的兵团解放包头、攻打绥远时，我下令所有的人送一件东西给老百姓。现在去看一看，在党的领导下，这些地方完全变了，家家有了电冰箱、洗衣机。当然，我们还有些老区很贫困，但正如一些同志讲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哪里会有今天。所以，教育必须从基层抓起，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乃至我们自己做起，要经常重温历史，不要忘记本。

现在，抗日战争纪念馆成为大家学习我们党、人民和军队光荣历史的课堂，作为我来说是非常高兴的，我是抱着向各位专家学习的目的而来的，借此机会，祝同志们工作顺利、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从华北危机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

桑 今

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中国，是实施所谓明治大帝遗策，即从“吞并满蒙”到“征服中国全土”。“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的一切野蛮暴行均为日本政府所承认，并取得裕仁天皇的敕令嘉奖，而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川繁等给天皇的奏折竟发出如此狂言“甲等敢放言之，对支那领土，可于三个月内完全占领也。”^①可见，日本侵略者是决不会以制造一个“九一八”事变和成立一个伪“满洲国”为满足的，他们蓄意使侵略战火继续蔓延，把魔爪很快伸入关内，肆无忌惮地向华北地区进犯。

1933年6月，日本陆相荒木贞大为了煽动战争狂热，喊叫“日本是天长地久的，并且命定了要进行扩张”。“日本民族的真正精神是从混沌中寻找新秩序以实现理想世界和东亚乐土。”日本“国防的意义就是用武力征服其他国家。”^②

关东军之所以对华北特别有兴趣，不仅是一般地为了扩大武装侵略，尤其重要的，还在于急于要把日本的国防线扩展到中国大陆上来。他们为了实现所谓国防资源的自给自足，满铁调查部根据官崎的报告，“认为只靠满洲的资源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因此绝对需要开发华北资源。”^③军部首领立即采纳了这个“用武力征服其他国家”的意见。众所周知，在日本国，军队是直属天皇的，天皇也说过军人“为朕之股肱”的话，而飞扬跋扈的关东军全然无视政府的外交方针，秘密地推行对华北的侵略；自恃有天皇作后盾，横行霸道，竟执意使华北乃至中国问题脱离外务省，由军

断然处理。

三十年代时，是国民党把持着中国的政权，日本侵略军闯进华北屠城掠地，抢占地盘，必然要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抗拒；共产党和全国的抗日势力，与日本侵略者更是势不两立。日本侵略军突破我长城防线，强划冀东为“非武装区”后，就加紧“华北工作”，掠夺掠夺地要华北方省（冀、晋、鲁、察、绥）特殊化，军部很多人，就是要华北制造第二次满洲事变建立“功勋”，以便将“功”捞取。

按照侵略者的旨意，1933年1月上旬，日本侵略军就闯过山海关；3月4日，又以100多人的先头部队，长驱攻占（热河省会）承德；发动对长城各口的攻击，企图一鼓而夺取华北。那知在全中国各族人民抗日热潮的鼓舞和推动下，驻守长城各口的中国守军和长城内外的义勇军，坚决奋起抵抗。同年3月，抗日将领冯玉祥又在张家口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举起抗日救国的旗帜。7月，先后克服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地，把日伪军全部逐出察哈尔省境，致使日本侵略军的狂妄企图一时难于得逞。

为了夺取华北的需要，日本侵略者还先后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攻势，迫使中国当局和他签订了若干次不光彩的“协定”。1933年5月31日，熊斌和冈村宁次^④签订“停战协定”于塘沽。根据这一“敷衍的屈服”^⑤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丢掉了东三省及热河，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的地区，并把整个华北置于日本侵略军监视之下，为进一步控制华北、策动华北“特殊化”扫清道路。

于是，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人羽英二出面发表一纸狂妄的（1944年）“四一七”声明，俨然以亚洲的“主人”自居，视中国为日本的独占“保护国”，声称它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有绝对垄断权，不许其他国家（主要指英美）染指。关东军驻华北的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司令部的秘密情报中说得更

露骨，“现在，满洲市场已臻饱和，短期亦难再行扩大……帝国原料与市场问题的解决，实不能不注意于进攻（华北地区），”中国的华北“在我帝国有计划之指导与经营下，则原料与产量能增加二倍，民众之消费能力亦自能大为增长。故华北，诚我帝国之最好新殖民地。”^⑥为了制造第二次“满洲事变”，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日本侵略军便处心积虑地寻找新的开端，在华北地区到处煽风点火。

于是，1935年5月底，日本北平满铁官给参谋次长（北）第384号特急（密）电报，为了彻底铲除华北的（抗日）行动，蒋介石必须放弃在华北的对日两面政策，国民党的一切政治、军事机构，均须一律从华北撤退。^⑦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德和日大使馆武官高桥坦亦在这时跳出来，节外生枝，制造口实，说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又借口说天津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和振报社社长白逾桓两名汉奸在天津日租界被暗杀——都是中国政府的排日活动，向国民政府要员何应钦提出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并从东北调集大批侵略军入关，威胁平、津，扬言如国民政府军及CC团等直接行动队不撤退出平、津地区，他们就要采取“自由行动”。这时，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要向视察满洲的陆军大臣林退告军情，即将留往奉天，启程时，口头批准酒井参谋长用呈谈方式向何应钦谈判协定内容。6月上旬，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就和酒井^⑧开始秘密谈判，几经密书和书信往来，到七月初才达成这样一个没有经过文字签订手续的《何梅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中国警察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并为日本侵略军在华北扩大侵略扫清了道路。协定明文规定：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和平、津的总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撤销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在此期间（6月27日），国民

党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代理察哈尔省主席秦德纯，还被迫与日本特务机关长上肥原贤二签订了《察哈尔协定》(又称《秦上协定》)，^④规定保证日本人在察省有权自由来往，取缔国民党党部、宪兵队及兰衣社在察省的活动，禁止排日行为，第二十九军必须从察省全部撤退；上肥原还与秦德纯口头约定，准许侵略军在察省设置机场和无线电通讯设备，由察省聘松井中佐为军事顾问，扫除在张家口地区的苏联经济实力等。

然而，日本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满足。在他们的导演下，华北地区一时群魔乱舞，大昏地暗，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汉奸白坚武、齐燮元、王克敏、于学忠等四川活动，阴谋制造什么“华北国”。10月22日，汉奸康丰武裴和流氓在香河暴动，占据县城，成立伪“县政临时维持会”，还发表什么“自治宣言”，11月25日，国民党政训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河北省的通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22县。在内蒙，上层反动分子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组织伪“内蒙自治军政府”，此外，还有“晋北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等伪组织接连出现。12月初，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了保住自己的实力和地盘，积极筹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从此，大大小小的狼群，打着叛旗，肆无忌惮地亦平、津地区游行，公然叫嚣“华北五省独立”等口号。华北殖民地化的危机四伏，一切热爱祖国的人民莫不忧心中仲。

驻伪“满洲国”大使董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又于1935年11月13日，搞了一个什么促进华北分离工作的建议，说“华北工作的最后目的，在于使华北各省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完全脱离南京政权而自行独立，”并认为当时“已经出现了为坚决贯彻帝国长期坚持的华北工作的绝好无比的时机。”^⑤而且关东军“已将一部分兵力集结于国境，”^⑥放手大胆地阴谋策划华北各省的“独立”。

为了遂行其侵略行径，1936年1月13日，日本政府抛出一个

“处理华北纲要”，炮制了促进华北五省“自治”的具体方针，即“先求逐步完成察察两省及平、津两市所自治，既而使其他三省自然地与之相结合”。^②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指导纲要，当时的计划是通过宋哲元来进行，如果冀察的自治达到大体上可以信任的时候，就尽快使其他地区与之合并。纲要计划得很周到的。

由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于1936年7月中旬突然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发表《东征宣言》，积极准备跨越河北抗日日本侵略军，日本方面急忙忙忙地和冀察当局签订了《华北防共协定》，矛头不仅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同时针对国民党政府军及全中国的抗日军民。《协定》首先要求力争与阎锡山缔结防共协定，当阎不同意时，日军则应赤膊上阵，进军山西，消灭其匪，同时，还要求“镇压、解散共产党”、“农社等与之类似的团体组织，不准其党部存在”、“镇压抗日团体和言论、肃清抗日教材”、“绝对支持冀察方面有关防共的行动”、“并绝对支持冀察方面遏制和防止中央军进入华北的行动”。^③

就在签订《华北防共协定》的前后——1936年春夏间，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已逐渐形成全国规模，而日本侵略者《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乃于1936年8月11日出笼。其要点是：“在于规划完成以华北民众为主的分治政治”，把华北变成“巩固的防共亲日、满地带”，分治的目的“在于否认该地区的中国领导权，培植成为脱离南京政府的独立国家，或者具体地实现满洲国的延长。”^④一句话，华北脱离中国，实际上归日本支配。一切听命于华北驻屯军。

从此，日本侵略者就积极密谋策划，准备见机而行，设想“可以不久时机地”寻衅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事变。^⑤

到了1937年6月，华北特别是卢沟桥一带的政治气候已骤起骤变，空中战云密布，大有一触即发的势头。

寇深矣，祸急矣，怎么办呢？全国人民忧心如焚，中国共产

党登高一呼，倡导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强盗。就在这深祸急的生死关头，于无声处响惊雷，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发表出来了，它呼吁各党各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特别重要的，是呼吁各党派抛弃过去的宿怨，以“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1935年秋后，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出于对抗日救国的紧迫感，立即着手同东北军、西北军联系，由周恩来担任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共产党还先后派汪锋、刘鼎、王世英、张文彬、朱理治等到西安，从事具体的安排和联系工作。

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发表，不但在国际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促进了国民党内部发生深刻的变化。冯玉祥首先表示响应，公开提出联俄、联共、共同抗日的主张；以宋子文为代表的英美集团，因此面产生了联共抗日的想法；方振武、陈铭枢、蔡廷锴等，先后在德国的《救国时报》上发表文章和谈话，表示拥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中央委员抗冲，将他秘密电台收听到的《八一宣言》的稿子随即抄送蒋介石；不久，蒋介石也有某些准备抗日的表现，开始着手改善同苏联的关系，相应地在国内也要改变同共产党的关系；到11月，宋子文又派另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曾养甫，授意早在“觉悟社”就认识周恩来的谢小岑，让他设法为“打通共产党关系”进行活动，声言蒋介石“一定抗日”，将“攘外必先安内”解释为“团结的安内”，列举事实说明蒋介石正在准备抗日。^⑧

正当华北时局万分危急，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中国共产党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推动下，由北平学联（党团书记姚依林）具体部署，数千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抗日救国示威游行；12月16日，全市1万多学生和

1万多市民又在天桥集会，通过了关于组织民众、共同抗敌、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决议案，群情激愤，威震全城。“冀察政务委员会”亦被迫宣布延期成立。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迅速得到全国抗日军民的热烈支持和响应。一时，全国东南西北各种规模的示威游行，风起云涌；从东北的《东北知识》到香港的《时代评论》等救亡刊物，达千种之多；《打回老家去》、《放下你的鞭子》等救亡戏剧激发着人民群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仇恨；田汉、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一类的救亡歌曲响彻祖国大地，激励着人民大众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革命精神。国民党首脑蒋介石也坐不住了，于12月19日，向苏联驻华大使鲍戈莫洛夫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达成（国共）团结，我将感到高兴”。1935年1月22日，蒋介石再次向鲍戈莫洛夫表示：“在红军服从（国民党）中央政府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存自己的编制，参加抗日”等条件下，他“可与中共达成协议”。^①就在这两次谈话中间，1935年12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认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我们必须发动、团结各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正式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方针，制定了抗日救亡十大纲领，调整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各项政策。会后，毛泽东还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作了深刻分析，还全面地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批评了共产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号召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这标志着共产党的政策，正经历着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历史转变。至此，抗日救国的浪潮弥漫全国。1936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的信使往来是比较频繁的。1月至8月，共产党方面原北平工委周小舟，四次赴南京和蒋介石等会谈；二月下旬，“红色牧师”李德普经过西安张学良处到达瓦窑堡，由林伯渠陪

同，将宋庆龄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私信面交傅青（秦德纯），传递了南京政府要同中国共产党谈判的意向。年初至九月，具有国共两党双重使者身份的张子华（真名王绪祥），数次来往于陕北苏区和南京、上海、广东间，虽然一度在南京被软禁，却起了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作用；潘汉年10月到上海，11月中旬到南京去和国民党要员陈立大会谈（张冲也在坐），结果都因国民党当局坚持收编红军的立场，念念不忘招降红军，会谈陷于僵局。在1936年的3月4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从山西石楼电告傅青和周恩来，提出“停止进攻红军，并允许主力红军向河北集中，首先抵御日本进”等基本条件和国民党谈判联合抗日。4月9日，彭德怀、毛泽东联名致电张闻天，阐明“日本正在企图用反共统一战线来击破我们的反日统一战线。此时我们应紧揭反日统一战线去击破日本的反共统一战线。因此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同月同日周恩来、张学良在延安深夜会谈，双方意见不谋而合，都认为推动蒋介石走向抗日是完全可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在内，但国民党的政策矛盾重重，有必要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4月25日“中共中央及时发表《为建立全国各党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提议各捐前嫌，‘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长驱直入，以反对汉奸卖国贼丧心病狂的无耻行为”。5月5日，毛泽东、朱德又代表红军向国民党、蒋介石等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电中称蒋介石及其同僚为“南京政府诸公”，并诚挚进言：当此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国的具体办法。

就在共产党一再敦促，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救国的大浪潮中，南京方面抗日、亲日两派斗争激烈，蒋介石也感到既要抗日又要反共的矛盾效果是很难协调的。他在7月召开的五届二中全

会上，对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的国策标准（即“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作了新的斗解，说“假如有人逼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又说：“一旦发生事变，也可以团结一致，共同负责来抵御外侮。”^⑤这时，国民党、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比之过去确有进步的明确。

五届二中全会是召开了，但国民党当局依然迟疑不决，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立即发动抗日战争的要求。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中，再一次大声疾呼，规劝国民党、蒋介石立即停止内战，发动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同时，向一切中国国民党人宣言，表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 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去反对全民敌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就在这前后时期，日本侵略者唆使伪“蒙古军政府”的保安队和伪蒙军李守信、土美等部，配合日本侵略军，进攻红格尔图 and 绥远，绥远驻军付作义等部两次奋起抵抗，将日伪军击溃，乘胜收复了白灵庙和大庙等地，粉碎了敌伪妄图成立“蒙古大元帝国”的阴谋。此次绥远抗战的胜利，中共中央在贺电中说，“付作义将军发起的绥远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蒋介石的贺电说，“百灵庙之收复，实为我民族复兴之起点”，^⑥国共有可能合作抗日，于此可见其端倪。

日本侵略军步步紧逼，而国民党当局还在那里踏步不前，为了进一步推动国民党当局迅速走向抗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于8月1日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肯定在当时紧急情况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并对蒋方指出用内战决不可能解决集中统一的问题，主要应当停止内战，才能实现一致抗日。从9月下旬开始，驻防西安的张学良与共产党日益接近，杨虎城部早和红军实行了停战，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有

代表到苏区求订抗日协定，华北的宋哲元、付作义等均派人到苏区接洽，马步芳有妥协线索，唯独马鸿逵始终坚持反共立场，不肯自绝于广大抗日军民。

共产党方面的联络代表于9月20日到广州。国民党当局请周恩来飞往香港或广州会谈，共产党具体的部署是：在进攻停止、周恩来未出来以前，准备派正在上海的潘汉年前往进行初步谈判。10月，苏维埃中央政府、红军军委发布命令，令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一切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仅在被对方攻击时，才允许采取必要的自卫手段。这些措施和上述致国民党书，已在全国各地及国民党军队中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而国民党当局却极惧红军三个方面军集中势大，犹醉心于西北则共，终于逼出来一个“西安事变”。实际上“西安事变”的真正目的，则是为了逼蒋抗战。经过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中共代表在西安先后和宋子文、宋美龄、孙科、蒋介石直接谈判，蒋终于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要求，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团结全国军民共同抗日，成为走向全国性民族解放斗争的转折点。

周恩来总结这段历史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全国抗战。这样，抗战是逼成了，谈判也算逼成了，统一战线也算逼成了。同时又证明，只有人民有力量才能逼成。”^①“西安事变”后，共产党最根本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促进联合抗日。为此，1937年2月，共产党方面以周恩来、叶剑英为全权代表，南京方面以顾祝同、张冲、贺衷寒为代表，开始在西安谈判。

与此同时（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关系和对日方针。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电》，正式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②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十四名国民党中央执、监委

员联名提议“恢复孙中山手订联俄、联共、拥护工农三大政策案”。经过各方面的积极努力，总算通过了一个有利于抗战救国的决议案。

日路第二次国共合作项目形成，日本侵略军迫不及行驰在北平（今北京）西南郊的卢沟桥，开枪向中国军队射击，炮轰宛平城（今卢沟桥镇），发动了新的武装事变，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冯治安部（二十七师）何基伟旅（一〇旅）当即武装抵抗，全国抗战从此开始。中国共产党于7月8日为日军进攻卢沟桥发出通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蒋介石也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虽然讲了一些“……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的话，总算还表示了“只要战端一开，‘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等对日抗战的态度，这标志着国民党从“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开始向抗日政策方面转变。

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共赴南京与会并与蒋会谈，划定作战地区，朱德被委任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这时南京上空空气浓厚，以张道藩、白崇禧、龙云等地方实力派纷纷和周、朱、叶会晤，势非抗战不可了。而日本侵略军经过周密策划，又于8月13日，以“保护侨民”为口实，对上海发动猛烈进攻，企图迅速占领上海，进而南京实现它“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国民党政府军在广大群众的推动支持下，又一次奋起抵抗，司令官开始是冯玉祥，嗣后为蒋介石兼任。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领导的人民抗日运动，出牛入死，在上海抗战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就在上海烽火连天之际，国民党终于8月22日将周恩来7月纷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公之于世。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并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至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